〈台灣佛教新史〉之二
——鄭成功與佛教淵源

闞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漢人大規模移民台灣，以鄭成功（1624-1662）驅逐荷蘭人入台為始。鄭成功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1]成功之父鄭芝龍（1604-1661）原是海盜，後為明朝、荷蘭買辦，而鄭芝龍「十八芝」武裝海商集團成員之一的劉香（？-1635），為佛郎機（西班牙、葡萄牙）買辦。

台灣博物館典藏的鄭成功畫像，經文建會指定為國寶。

南安屬泉州管轄，為閩南之一部分，閩南佛教自古興盛。崇禎二年（1629），鄭芝龍降明，劉香拒絕，兩人因而決裂，據《海上見聞》載，崇禎八年（1635）四月，鄭芝龍弟芝虎、芝鵠與劉香大戰於廣東虎門，雙雙陣亡，「（鄭芝龍）大痛哭芝虎、芝鵠身亡，令人廣撈屍首，五日不可得。停甲子所，延僧建七晝夜梁皇寶懺，祭奠二人暨陣亡

1. 清・鄭亦鄒：《鄭成功傳》，臺灣文獻叢刊第 67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51。

諸將士，然後班師」。[2] 鄭芝龍延僧舉行梁皇法會，以祭陣亡官兵，時鄭成功 12 歲，必然有所知悉。

順治三年（1646），清軍自浙江下福建，鄭芝龍認為復明無望，「撤仙霞關守兵不為備」，清軍師次泉州後，「書招芝龍，芝龍率所部降，成功諫不聽」。[3] 鄭芝龍要鄭成功歸降，但鄭成功不願臣屬滿清，苦勸鄭芝龍未果後，遂儒冠儒服祭拜孔廟後率部出海。

學者大都認為，鄭成功乃是以一「儒將」而領軍抗清，因鄭成功 15 歲「補弟子員，試高等」，[4] 考取南安縣學生員後，入貢南京太學，及清兵南下，父芝龍降清，「方其諫父不聽，被貝勒王挾北去，又痛母死於非命；乃悲（歌）慷慨謀起師，攜所著儒巾襴衫赴文廟焚之，（四）拜先師，仰之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惟先師照鑒之。』」。[5]

那麼，出身儒家系統的鄭成功與佛教的關係為何？從史料中發現，據守金廈抗清的鄭成功，曾與黃檗隱元禪師及萬五道宗和尚有所交往，本文將從鄭成功與這兩位方外之交身上，了解鄭成功與佛教的淵源。

二、「萬姓集團」道宗和尚

1644 年清兵入關，在諸多抗清集團中，以鄭成功領導的大軍持續最久，影響最深遠。抗清團體彼此合作亦是常態，其中，由萬禮

2. 清．江日昇：《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40-42。

3. 同註 1。

4. 同註 1，頁 2。

5.《鄭氏關係文書》，臺灣文獻叢刊第 69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頁 39。

領軍的「萬姓集團」為其中之一。

萬禮原名張要，又名張禮，明萬曆四十年（1612），生於和平琯溪，幼家貧，被九甲富商張子可（紹安長林寺緣主）收為養子，自幼練拳習武，廣交朋友。他們化異姓為同姓，「萬人同心，以萬為姓」，建立一支民間武裝集團，占據官陂二都一帶，張要被推為首領，稱萬禮、萬一、萬大、萬九澤。[6] 清・江日昇的《臺灣外記》記載：「（萬）禮即張要（要），漳之平和小溪人。崇禎間鄉紳肆虐，百姓苦之；眾謀結同心，以萬為姓，推要為首。時率眾統踞二都……。」[7]

南明永曆三年（順治三年，1649），鄭成功「遣其將施琅等陷漳浦，下雲霄鎮，進次詔安」；[8] 永曆四年四月，鄭成功為籌糧餉，親往廣東揭陽，攻新埠寨；五月，命左先鋒鎮施琅（1621-1696）招撫萬禮，《臺灣外記》載：「詔安九甲萬禮從施郎（琅）招，領眾數千來歸。」[9] 永曆七年（順治十年，1653），因攻海澄，萬禮被封為「建安伯」。[10] 其中，為「萬姓集團」運籌帷幄正是其弟，排行第五的萬五道宗和尚（1613-1701）。道宗又稱達宗，明末抗清政治人物金門盧若騰（1600-1664）在〈贈達宗上人〉文稿中，透露了道宗與鄭成功的關係：

建安伯春宇萬公之弟，原住長林寺。春宇萬公即萬禮，原

6. 湯毓賢：〈「明朝遺老」張士良研究——兼談「萬姓集團」與天地會起源〉，《漳州職業大學學報》，2003 年 4 月，頁 70。
7. 清・江日昇：《臺灣外記》，頁 112。
8. 清・鄭亦鄒，《鄭成功傳》，頁 52。
9. 同註 7。
10. 清・彭孫貽：《靖海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35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29。

姓張、名安，平和小溪人。崇禎間，鄉紳肆虐，百姓苦之；眾謀結同心，以「萬」為姓，推安為首，率眾踞二都。至永曆三年，歸鄭國姓；永曆封為建安伯。[11]

詩中還稱達宗為「君家兩俊傑，異道卻相謀；以爾津梁法，為人幃幄籌。心惟存選佛，骨不羨封侯。軍旅喧闐處，長林未改幽」。[12]從上文「永曆三年，歸鄭國姓」看來，道宗和尚隨「萬姓集團」歸入鄭成功麾下就是在永曆三年。

最能體現鄭成功乃至鄭軍與萬五道宗之關係者，為〈長林寺記〉。1993 年，福建詔安官陂長林寺遺址出土了〈長林寺記〉碑文，清楚交代鄭成功與道宗的關係，其碑文如下：

夫棲真匡徒，則叢林著規，談空證有，亦義林開教者。叢林之鼎襄也，禪門攸宗也。是故獨居寶林曹溪，開五葉之花；鼎建少林跋陀，操一怒之指。□□□□長林與西林，聯壤靈隱靈鷲；武林追洹林，爭勝亙古迄茲。夫焉惠德，則未可替。□□□亦長林寶剎，實緣第五和尚道宗創造也。地在於詔萬山深處，佛天鍾靈，機緣湊巧，得大檀樾藩府拓其基，緣首永安伯黃暨列勛鎮諸公奠其成。經始於癸巳年臘月，竣事於甲午年葭月。予乃

長林寺石碑

1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詩鈔》卷 1，臺灣文獻叢刊第 280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 年，頁 18。

12. 同註 11。

邀中貴弟與道宗弟共承葉之，則又以長之一言為禪弟志慶，兼為之勸勉。慶則慶之，于見在修六道，證四象，曰：長發其祥；勉則勉之，以徹夜悟八正，入三昧，曰：永言配命。未審有協於禪弟否？□□建立精舍，吾云有小隱，銅陵有九仙，隨地喜捨，到處生蓮，如是功德，不可思□，□□□□，配於林也。

計開緣主張子可捨寺地並田種廿五石……陳氏子廖、子和，捨田種一石七斗……開山主自置田種三石……助緣列勛鎮爺：黃山、張進、萬禮、洪旭、蔡祿、林勝、余新……信士……信官……。

甲午年臘月八日兄髮僧士良思元甫頓拜首書。[13]

文中所云「大檀樾藩府」即指鄭成功，因為永曆三年（1649），鄭氏於銅山受南明政權封延平公建藩。[14] 又云「經始於癸巳年臘月，竣事於甲午年葭月」，得知長林寺始建於 1653（癸巳）年，竣工於 1654（甲午）年農曆十一（葭）月。從上述碑文可知，詔安官陂長林寺之建立，鄭成功曾參與其事。

道宗雖未從軍，但卻為「萬姓集團」運籌帷幄，其生平大概如下：俗姓張，原籍詔安二都九甲，少年習佛，修文習武，明崇禎四年（1631）應知州吳燮文之請，任雲霄白塔龍湫岩住持；崇禎八年（1635），到銅山（五都）改建興教寺舊址為初來寺；崇禎十二年（1639），駐錫金門太文岩，後返詔安九甲，與堂兄萬禮創「萬姓

13. 湯毓賢：〈「明朝遺老」張士良研究——兼談「萬姓集團」與天地會起源〉，頁 68。

14.【日】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 年，頁 32。

集團」；永曆五年（1651，順治八年），住銅山九仙岩；永曆六年，於詔安官陂九甲建長林寺化蓮堂；永曆八年（1654，順治十一年），回九甲擴建長林寺；永曆九年，應鄭經之請，卓錫廈門萬石岩附近之碧蓮寺。[15]

道宗和尚獲得鄭成功的信任，從以下故事可知一二。順治十二年（1655），鄭成功入漳浦，擄因病歸鄉的東昌府推官蔡而烷，囚禁於廈門乞輸餉，其子蔡祚達「急走廈門願代父繫，不得」，這時，「有長林寺僧萬者，鄭所善也；憐之，為達之鄭，如所請」。[16]

正如前述，長林寺為鄭成功捐緣所建，由道宗和尚住持，故「長林寺僧萬者」必然指道宗和尚，道宗因為憐憫蔡氏父子之遭遇，特地為蔡祚達拜訪鄭成功，鄭成功最後應道宗所請而釋放蔡而烷。可見鄭成功入台前，與福建地方的佛教僧人是有接觸的，特別像是道宗和尚等反清僧人。

隱元隆琦像，十七世紀江戶時代喜多元規所繪，京都萬福寺藏。

三、黃檗隱元禪師

鄭成功與佛教人士交往最著名的另一位，則是福清黃檗（蘗）寺僧隱元隆琦（1592-1673）。

明清之間，天下大亂，東渡日本僧人不乏其人，永曆八年（1654，順

15. 同註 13，頁 70。

16. 清．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臺灣文獻叢刊第 195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年，頁 115。

治十一年），隱元應日本長琦福興寺住持逸然性融（1601-1668）之請，前往住持新建之崇福寺，根據《海上見聞錄》[17]之記載，鄭成功於順治十七年七月，「命兵官張光啟往倭國借兵，以船載黃蘗寺僧隱元及其徒五十眾；時倭人敦請隱元，故載與俱往」。[18]事實上，隱元禪師東渡日本時間為順治十一年，與《海上見聞錄》所載之順治十七年，有 6 年的差距。

據《普照國師年譜》所載：「（順治）十年癸巳，日本興福寺住持逸然，奉王命，差僧古石齎書帛聘師東渡。……十一年甲午，師六十三歲，上元日，兩序仝眾護法，以師有東應之事，詣方丈哭留，師憫眾誠為躊躇久之，但法語已出，欲踐其言，遂有決應之意。」[19]雖然借兵之說為大陸學者所否認，但是，鄭成功確實派兵護送隱元師徒一行赴日，[20]「普照」即是日皇敕封隱元之國師號，故從《普照國師年譜》可得知鄭成功與隱元禪師交往之經過。[21]

永曆八年（1654）五月十日，隱元離開福清黃檗山萬福寺後，南下會晤鄭成功，「是日汶石晃法姪迎宿資福，經上生抵蒲城，寓鳳山，駐駕五天……二十日至泉州，木首座迎入開元寺……六月初三至中左，寓仙岩」，[22]二十餘天的行程，終於見到鄭成功，「藩

17.《海上見聞錄》為記載鄭成功、鄭經、鄭克塽三世延平王的編年體史書，是研究明鄭的重要史料，作者為阮旻錫。

18. 清・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24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36。

19.【日】性派：《普照國師年譜》（上），（出版者、時間不明），頁 26。

20. 參見胡滄澤：〈鄭成功與隱元禪關係略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4 期，頁 98。

21. 同註 19。

22. 同註 19，頁 1-2。

主（案：鄭成功）送齋金為供，建國鄭公（案：鄭彩，1605-1659）暨諸勳鎮絡繹參謁，師以平等慈接之，各盡歡心」。隱元及徒眾一行在中左（廈門）盤桓二十天後，六月二十一日，「藩主備舟護送」，七月五日抵長崎。[23] 從《旅日高僧隱元中土來往書信集》中得知，隱元赴日後，鄭成功曾致隱元信函：

> 得侍法教，頓開悟門，執手未幾，忽又言別，唯有臨風神想耳。但日國之人雖勤勤致請，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風廣播乎？抑虛慕其名而姑為此舉耶？倘能誠心皈依我佛，自當駐駕數時，大闡三昧。不然，不必淹留歲月，以負我中土檀那之願。況本藩及各鄉紳善念甚殷，不欲大師飛錫他方，所以撥舟護送者，亦以日國頂禮誠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龍天實相，弘道誠莫分於彼，審勢自不無後先，唯大師慧炤之。其黃檗叢林弟子，自當杖佛力保護，無庸致慮也。盈盈帶水，神注徒深，屈指歸期，竟知何日？謹啟。法駕榮行，本藩不及面辭，及次早聞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禮為歉。貼回拜，謹即附聞。名單具。[24]

因清兵騷擾黃檗山，加之受日方邀請，隱元率徒眾赴日，只能走水路，故在東南沿海活動，若無鄭氏之助，貿然出海是極其危險之舉。隱元禪師等人最後從廈門出海，雖然與鄭成功直接接觸不過二十天，但備受禮遇卻是事實。另，《臺灣外記》的記載雖有傳說

23. 同註 19，頁 1-2。

24. 引自胡滄澤：〈鄭成功與隱元禪關係略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頁 98。

成分，但不失為參考資料：

> 成功踞金廈，震動濱海。有問黃蘗寺隱元禪師曰：「成功是何星宿投胎？」元曰：「東海長鯨也」。再問：「何時得滅？」元曰：「歸東即逝。」辛丑，成功攻台，紅毛望見一人峨冠博帶，騎鯨魚從鹿耳門遊漾而入。後功諸船果從是港進。癸卯年四月間，功未病時，有副將楊明夢成功寇帶騎鯨魚，由鯤身之東出於外海。覺而大異，與人述之。不數日，而成功卒。正符隱元「歸東即逝」之言。按隱元住黃蘗寺，德行精修。曾遣其首座報師過日本國。至港口，舟覆而死。越歲，元往。將至港口，夢首座領眾來迎。次日，風浪大作，群魚千萬。船眾咸恐慄，共請於元。元曰：「毋慮！」令侍者出紙筆書「免朝」二字於水仙門外焚之。頃而風息魚散。元居日本，國中人奉如活佛。[25]

順治八年（1651），日方來邀隱元禪師東渡時，他並未允諾，而是指派他的法子也懶性圭前往，但也懶不幸「至港口，舟覆而死」，至 1654 年隱元東渡，「應日本一段因緣，實基於此」。[26] 隱元決定東渡後，即透過鄭成功船艦的護送，成功東渡日本，為江戶初期的日本佛教注入養分，其影響至深且鉅。

連橫（字雅堂，1878-1936）談到台灣佛教時謂：「佛教之來，已數百年，其宗派多傳自福建。黃蘗之徒，實授衣缽……徽音古德，

25. 清・江日昇：《臺灣外記》，頁 405-406。
26.【日】性派：《普照國師年譜》（上），頁 14。

代有所聞。而黃蘗寺僧尤特出。」[27] 黃檗僧人不僅在清朝收復台灣後有極大影響力，在日本更是動見觀瞻。黃檗弟子持續東渡，比如高泉性澂（1633-1695），原是代他師父慧門催促隱元回國，但最後卻留在日本。[28] 史載：「高泉禪師，本朝初閩人；後居日本黃蘗山；著有『洗雲詩集』、『佛國詩偈』、『藏林集』。其弟天池，閩僧，能書。國禁僧不得渡海入中國，惟至日本參學者有之。」[29] 續東渡之「遺民僧」有之。

順治十八年（1661）五月，高泉與曉堂、未發、柏巖、惟一四人，東渡日本，高泉卓錫於長崎崇福寺後，寫信送往隱元所在之古黃檗，信載：

> 茲遠召老人（隱元），併承本師（慧門）之重委，為負群公命來。……一遵老人之嚴旨，一代本師上壽。意一舉兩當。然後，欲勸老人歸駕，此又其大事。若再越數年，老人老矣，安有回山日？某之志在此，非為助揚行化而來。[30]

雖然高泉主要目的在規勸隱元回國，不是為了協助隱元弘法，但顯然隱元不為所動。翌年，高泉乃決定與曉堂回中國，但因國內戰亂只能留在龍溪，無法回國。[31] 高泉等人賡續隱元乃至臨濟宗法脈於日本，隱元臨濟一系在日本的影響逐漸壯大。

---

27. 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576-577。
28. 【日】木村得玄：《初期黃檗派の僧たち》，東京：春秋社，2007 年，頁 88。
29. 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306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年，頁 217-218。
30. 同註 26。
31. 同註 26。

四、鄭成功退守台灣

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1659）春，「成功遷魯王於澎湖。桂王出奔緬，大清盡取雲南地。夏六月，成功北舉，克鎮江、圍南京」；[32] 同年七月「成功潰歸」，[33] 進入守勢的鄭軍「外則置兵守金門、廈門兩島，與相犄角；又通使斐律賓群島，求聘問於西班牙總督，欲以得海上之應援」。翌年正月，鄭成功「議取台灣。……海邊貧民流寓者，種蔗煮糖為業，殆數千戶。時紅夷亦恐海上動兵，故於庚子（1660）春復遣通事舍人何斌及其酋長再來議貢。何斌密進地圖，勸賜姓（案：鄭成功）取之」。[34]

清廷知道鄭成功終究不降，乃於順治十八年，「誅其父芝龍，並誅鄭氏子弟在京者，而詔徙福建沿海三十里內之居民於內地，禁漁舟商船出海，將以堅壁清野之法困之」。[35] 高泉東渡日本之際，也正是鄭成功攻台的一年，史載：

> （鄭成功）乃於辛丑三月百艘泊澎湖，次鹿耳門，潮水驟漲高丈餘，揚帆直達。夷人驚怖莫措，遂克赤崁城；進逼王城（城為荷蘭所居），久不下。冬十月，我朝棄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之在京者，無少長皆伏法。十二月，成功悉力攻荷蘭城；曰：「斯為先人故土；所志在城，餘以歸汝！」[36]

32. 清・邵廷采：《東南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96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34-35。
33. 同註32，頁34-35。
34. 清・阮旻錫：《海上見聞錄》，頁36。
35. 清・汪榮寶：《清史講義選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21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年，頁55。
36. 清・徐鼒：《小腆紀傳》，臺灣文獻叢刊第138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462-463。

1661 年 3 月，鄭成功「泊澎湖，至鹿耳門，引兵登岸，克赤崁城。荷蘭戰不利，退保王城」。到了 12 月，「成功復攻王城，因風縱火，燒其夾板」，荷軍雖敗，但荷蘭台灣長官揆一（1615-1687）敗而不降，成功使告之曰：「此地迺先人故物，珍寶不急之物，悉聽而歸，地歸我，兵始罷。」

雖然鄭軍已圍困荷軍，但「半載不下，乃絕水源以困之」，最後「荷蘭棄台灣，以大舶遷去，鄭氏遂有台灣，與金、廈兩島相犄角」。[37] 鄭成功因改「台灣（台南）為安平鎮、赤崁城為承天府；總曰東都。設府曰承天，縣曰天興、萬年」。[38] 鄭成功「既克台灣，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修武備，大起池館，延納名流。以赤崁城為東都，曰承天府；縣曰天興、萬年」。[39]

雖然鄭成功於 1662 年 5 月 8 日病逝於台灣，「迺立興法、辟刑獄、起學宮、計丁庸、養老幼、恤介特、險走集、物土方；台灣之人，是以大集，鄭氏遂安」，[40] 其所制訂長治久安之計，迨鄭經（1642-1681）繼位後，政權得以延續 22 年之久。

鄭經主政後，改東都為東寧，在承天府及天興、萬年州逐步發展，佛教寺院至少有六座建立，即竹溪寺、法華寺（元漳州人李茂春搆茅亭以居，名「夢蝶處」）、觀音堂、準提室、觀音亭、龍湖巖。下期將述及鄭氏三代統治時期在今台南地區所建立的寺院及僧侶的活動。

37. 清．王之春：《清朝柔遠記選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126 種，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頁 4。

38. 清．鄭亦鄒：《鄭成功傳》，頁 21。

39. 同註 36。

40. 同註 38，頁 22。